

抗 議

期六十二第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特載)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特稿)

和平運動期間之民眾運動方法論(專載)

蘇聯怎樣侵略芬蘭

芬蘭之遭遇與中國

南甯失陷啼笑皆非錄

美國欺弄波蘭的聲影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選譯)

日本與英國

江南淪陷區域內日商工廠的活動

重振道德運動與肅清共產黨

予欲無言集

汪精衛

馮 遜

楊靜之

鍾 南

楊乃昌

仲 平

劉鏗譯

毛一波

木軍譯

汪壽昌

沈 昂

葉紅懷

版出日一十月二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特載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汪精衛

十一月二十三日對日本軍官傳主任孫傳會講列席官演講

各位先生：

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各位講述三民主義，心裏非常高興。三民主義的內容很廣，如今只能簡括的先說大概，再就其中一二要點，加以闡明。

三民主義的特質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博採歐美許多學說，然而它的本質，却是以中國固有的根本思想為根據的，和歐美種種學說，都不盡同。

例如民族主義，與歐美的國家主義不同。國家主義是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則產生在中國固有的和平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排外的意思。

民權主義與歐美天賦人權說不同，與歐美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天賦人權說所主張的是個人自由，而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則是全體自由，不是個人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上着想，而民權主義則在政治上着想，質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目的，就是全民政治。

民生主義也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同。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曾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是泛就一般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極的目的而言，並不是說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孫先生在這一句話之後，緊緊的接着說：「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

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看到尾，才可以明白了解」。從第一講以下，便將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不同的要點很明白很詳細的指出來。馬克思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主張階級合作，一個用暴力的方法，一個用和平的方法，這一點，完全不同。馬克思共產主義絕對廢止私有財產，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在計劃經濟之下，一面發達國家資本，一面保護私人資本，這一點，又完全不同。

由此看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自有它的特質，和歐美的國家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全然不同。

為什麼孫先生要提倡三民主義？

孫先生為什麼要提倡三民主義呢？用意在那裏呢？

孫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就說，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以救國為目的，從救國的立場出發。歐美的殖民主義侵略中國，壓迫中國，使中國不能獨立生存，使中國不能自由平等，已經一百年了。三民主義就是要喚起全中國的人民，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侵略，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壓迫，爭取中國的獨立生存，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孫先生自從提倡革命以來，畢生精力，盡瘁於此。

民國十三年以後，孫先生看到歐美殖民主義之外，還有

共產主義，為患於世，所以著述民生主義，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民生主義是在十三年間講演，可惜還未完畢，孫先生便與世長辭了。

十三年間正是容共的時候，然而孫先生當日對蘇聯的看法，和對共產黨的看法是不同的：對蘇聯認為是友邦，對共產主義則始終認為國家社會禍亂之源；所以在民生主義的講演裏，特別指出馬克思共產主義的錯誤，使一般青年，信奉民生主義，不要信奉共產主義。

容共的本意就是要共產黨拋棄它的組織，服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拋棄共產主義，信奉三民主義。

十六年間，共產黨背信棄義，逆跡昭彰，中國國民黨決心清黨，把共產黨徒，清除了去，且進而痛剿之，這決心正是表現：中國國民黨始終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從此以後，反共精神，普遍全國，至今不渝。只有蔣介石，因為西安事變，於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共產黨訂了密約，便背叛孫先生遺教，違反全黨公意，私行容共。可是，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之外，凡是中國國民黨的忠實同志，沒有一個人不是永遠堅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

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第一個要着，在使中國從歐美經濟侵略、經濟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人們常常以為中國只是一個半殖民地，但是，孫先生很痛心的說，中國簡直是一個次殖民地，不只是半殖民地。殖民地不過受一個國家的侵略和壓迫，中國却受着許多國家的侵略和壓迫。孫先生提倡革命，就是要使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自由平等。

怎樣纔能夠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中國的自由平等呢？

孫先生定下了兩個方案，第一是要中國自己努力，第二是要與先進國的日本共同協力。

孫先生生時，中日關係，有過惡轉的時候，但孫先生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始終不變。孫先生也有批評日本的時候，可是，他的批評，總是期望日本與中國攜手為友，不要與中國相對為敵。這在民族主義講演裏看得出來，在其他與民族主義有關的遺教裏也都可以看得出來。試舉兩例以為說明：

孫先生遺教中有一部「中國存亡問題」，是民國六年著述的。那時候，協約國勸中國和他們一起，參加歐戰；孫先生堅決反對，發為此文，就中最重要的一段說：

「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以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為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次之則為美國。美國之地位雖與我隔，而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況兩皆民國主義，尤可以相扶。中國而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其機會，必當倍資於美國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文同種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與日本，以種族論，為弟兄之國，與美國，以政治論，又為師弟之邦；故中國實有調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義務者也。妄人乖忤之計，詎可信耶？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

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中國若循此道以爲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絕去也。

孫先生之重視中日關係，其深切著明且如此。尤其要注意的，民國六年孫先生發表此文，正是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款之後，此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怨恨至深。所以贊成參戰，無非想在協商國勝利以後，藉其力量牽制日本。孫先生則不但反對參戰，並且說，「無日本即無中國」。我們知道，孫先生對於二十一條款，自然也是反對的，但是他認定冤仇宜解不宜結，所以始終期望日本和中國，彼此要作朋友，不要作敵人。對於當時反對論者，悠悠之口，概不介意，其所關切的，是趁着歐戰的機會，中日兩國，確立友好的關係，彼此合作，那麼，日本沒有對於中國之顧慮，發展更快，中國得到日本之援助，發展也易，並且更可以中日兩國之協力將歐美經濟侵略經濟壓迫的勢力，從東亞排除出去。這是民族主義的精髓，也是民生主義的精髓。

孫先生所顧慮的是，日本的處境既孤，中國的國勢又弱，所以盼望由中日友好關係，擴而充之，做到日美關係的好轉，以確立中日美友好的關係，而以中日合作爲其前提。

孫先生抱定了這個信念，由民國六年到民國十二年，六年之久，在這期間，有時到上海，在租界上過着亡命的生活，中，醞釀革命，有時到廣州，在一塊小小的根據地上，策動革命；但爲環境所限，沒有完成革命的力量，卒未能發展他的抱負。

十二年間，俄國越飛來華，孫先生在上海和越飛發表聯合宣言，俄國方面聲明在非欲求中國共產化，只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不久，孫先生回到廣東，十三年春間召集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這是聯俄容共之始。十三年冬，孫先生北上，由廣州至上海，於赴天津途中，特意道經神戶。

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孫先生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各團體演講「大亞洲主義」，同時在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會演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話說：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本維新之時，歐美勢力還未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全完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已侵入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回主人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樣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處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兄弟聚會，要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奴隸，向來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

等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這一段說話，透澈極了，中日是兄弟之邦，亞洲是我們的家庭，我們應該怎樣的互相幫助，互相合作，來復興我們的家庭啊。

於此，又有須注意的，這兩篇演講和上面所引「中國存亡問題」，許多人定然看過，但許多人都一樣的沒有注意到他的時代。這兩篇演講，正是孫先生聯俄容共的時候發表的。既然聯俄，為什麼又和日本講大亞洲主義呢？因為孫先生始終抱定了一個信念，以中日合作為前提。中國要從次殖民地地位解放出來，便要聯合友邦，共同奮鬥。蘇俄既然願意與中國為友，中國自然樂得與蘇俄為友，但是，如果中國和日本不能提攜合作，則聯俄終是徒然。反之，中日既然合作，中俄又合作，則日俄也可合作而不受其牽制。雖然中日蘇俄，國體不同，不過，外交是外交，國體是國體，民生主義的中國與共產主義的俄國，在外交上可以聯合；一樣的，日本與蘇俄，在外交上也未始不可聯合。

然則孫先生為什麼不先聯日再聯俄呢？

這點孫先生早打算過了，聯俄之前，孫先生好幾次對日本表示，希望中日合作，可是沒有具體結果，所以聯俄之後他便趁北上機會，道經日本，對日本朝野宣傳大亞洲主義。還記得當日孫先生取道日本北上，命我由上海直接赴天津，臨別時，孫先生對我說：「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諒解，中日俄聯合起來，我們東方便有辦法」。

由此可見孫先生的根本信念，前後是一貫的。民國六年，他所重視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而期望中日兩國都得到美國的友誼結合；民國十三年，他所重視的也是中

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然後聯俄才有用處，然後中日俄三國才能聯合起來，謀東亞問題之解決。

國際關係，千變萬化，因之外交應付，也隨之而變。六年之主張聯美，十三年之主張聯俄，在外交應付，本無足異。然而無論怎樣，孫先生自始至終，抱定了一個信念，永遠不變，這個信念便是以中日合作為解決東亞問題之核心。

孫先生說：「中國與日本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這一句說話，有着極深遠的意義，不是泛泛說的。爲了兩國的存亡安危，中日合作，不但於中國有利，並且於日本有利，於東亞有利。在合作的原則之下，中國和日本，外交方針一致，國防方針一致，彼此之間，既然不會再有衝突，更可以攜手共進，以應付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對於其他國家，要聯合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為友，要對抗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為敵。只有這樣纔可以奠定東亞之永久和平，只有這樣纔可以謀大亞洲主義之實現。

中國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並且要有力量來分擔這個責任。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從次殖民地地位解放出來，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得到自由平等，中國便沒有力量來担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明治維新，日本發奮圖強，走在前頭。中國呢，直到現在，還在爭取民族獨立的苦鬥中。在中國，爲本身着想，爲分擔東亞的責任着想，固然要努力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在日本，爲本身着想，爲謀中國之分担東亞的責任着想，也要以先進國的地位，幫助中國，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

中國要努力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第一要打破百年來歐美殖民主義的壓迫，這就是民族主義；第二要有強力的政治機構來改造政治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這就是民權主義；第

三要有健全的經濟制度來發達民力，充實國力，以抵抗歐美殖民主義的經濟侵略，這就是民生主義。分而言之，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而言之，便是三民主義，其精神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

本着三民主義做去，中國固然得到自由平等，同時也有了力量與日本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所以就中國來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就東亞來說，三民主義也就是大亞洲主義。

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

如今就三民主義與最近的和平運動，再說幾句話。

這幾年來，中日關係日趨惡化，因為關係惡化，所以中國抗日，又因為中國抗日，所以關係愈見惡化。這樣下去，循環不已，沒有止境的。

到了去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中日關係才有了一個轉機。

近衛聲明提出三個原則，一是善鄰友好，一是共同防共，一是經濟提携。

就第一個原則來說，善鄰友好正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就第二個原則，共同防共，固然不是對俄，而是要防止第三國際的擾亂陰謀，使其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就第三個原則來說，經濟提携，並不一定是對付那一個國家，而是以中日兩國的協力，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力量，抵抗殖民主義的經濟侵略、經濟壓迫，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實而言之，目前中日和平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三民主義的

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

以上就理論來說。至於實行呢，我感覺過去數年，中日關係惡化，在外交上國防上，彼此方針，背道而馳，我個人也只能枝枝節節盡了一些努力，無補大局。我深深盼望這次和平運動，中日兩國能夠從根本上做起，為中日關係劃一新時代，為東亞劃一新局面，本於平等合作的精神，確立兩國一致的外交方針，國防方針。方針一致，則善鄰友好，可以做到，共同防共，可以做到，經濟提携也易於着手了。

說到經濟提携，有些人抱着悲觀的論調，我個人則以為中日兩國，真能誠意相處，平等相待，經濟提携，定然有樂觀的前途。就中國來說，今後經濟建設以民生主義為中心，民生主義的具體實行，以孫先生的實業計劃為根據，而其最大目的，一是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是掃除買辦資本對歐美之依賴。就中日關係來說，經濟提携也正是要以日本的協力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掃除買辦資本對於歐美之依賴，而同時使中日兩國的經濟上有平等合作自由發展的機會。也許中國方面，有人疑懼，在經濟提携條件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發展。這是錯誤。在日本方面，又或有人以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達，於日本不利。也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知道東亞在歐美資本勢力支配之下，要不是聯合兩國的經濟力量，決不能與之對抗的。然而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日不發達，即中國一日沒有力量協助日本與之對抗，經濟提携，何從說起？明白了這一層，便可以知道，本於民生主義，施行實業計劃，一方面發達民族資本，一方面掃除買辦資本對歐美之依賴，並以謀中日之經濟提携，是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於整個東亞有利的。今日將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以及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的關係，簡單說明。時間匆促，只能舉其大要，然而三民主義的真論，也就於此可見了。

特稿 和平反共復黨建國

馮 適

126

七 從救國到建國

抗戰之初，有一個口號叫「抗戰建國」，現在我們又提出一個口號叫「和平建國」。到底「抗戰」與「和平」二者那一樣是「建國」的呢？不可不辨。

我們首先要向國人指出：「抗戰」的最大任務是「救國」，「和平」的最大任務才是「建國」。在「救國」與「建國」之間，雖也無法區別其最明顯的界限，但就其主要的最大的任務而言，各個的意義也不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人的生病：在病勢尚未發作僅是體勢已呈敗象的時候，治療的方法當一面培補元氣，一面預防病勢之來攻；若病勢業已發作，則當以疏散驅解為急務；及至病象已退，則又當着重於調理培補了。國事也是這樣的：在國力未充而外患日逼的時候，應一面充實國力，一面策劃外患之避免及應付；若外患已來臨，則惟有傾全國之力，與之抵抗；及至外患之情勢已退，則又當從事善後重圖國力之恢復了。充實國力的工作，是「建國」的，抵抗外患的工作，是「救國」的。可知在上面所舉的三個階段中，第一階段「建國」與「救國」同時並進的，第二階段是以「救國」為主的，第三階段是以「建國」為主的。

七七事變以前，屬於第一階段。故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開宗明義的這樣說：「中國國民革命之主旨，見之於總理孫先生之遺教者，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曰『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曰『和平奮鬥救中國』，曰『吾人必須團

結四萬萬人民為一大國族，建設三民主義的強固充實之國家，始足以生存於今日之世界」。是知革命目的唯在於「救國」與「建國」。國：「救國」「建國」雖有本末之殊，而在中國今日，則非以自身刻苦之奮鬥，澈底更始之覺悟，恢復民族精神，追蹤近代進步，以建立一人力物力並皆發展充實之近世國家，決無以克環境之艱危，致國家於鞏固。……本大會鑑於此等歷史之教訓，願以「救國」「建國」同時致力之意義，昭示吾全國同胞，期相與為同德同心之努力」；接着，列舉「有關於建設國家挽救國難」的十項「要計」，以為「團結國民共同努力之前提」；末後并把宣言要旨總結的說：「今日之事，已無治標治本之可分，必須為同時並進之努力」。

這一段引述，就是說明中國在七七事變以前的第一階段中的「救國建國同時致力」的意義，同時也可明瞭「救國」與「建國」二者的根本性質。在此期間，若果「救國」與「建國」兩大工作都已做到圓滿地步，自然不會有七七事變的發生。無奈建國的工作尚未打定鞏固的基礎，救國工作竟又走錯了路，由於共產黨在西安放了一把火，便把七七的戰幕布道完竣了。此一變化，對於「救國建國同時致力」的國策，無疑的，是一大沖擊。經過此一沖擊，國策是改變怎麼樣了呢？那是盡人皆知的，只有奮起抵抗了。因為當時日本並不以平等待我，惟以武力侵略相加，若不抵抗，勢必亡國。要拯救國家於不亡，自然非抵抗不可。這個意義是很簡單的，就是「抗戰」的主要目的在於「救國」；國家得救，才可進而言「建設」

。故在抗戰期間，雖然不可忽視『建國』的工作，而在緩急輕重的比較之下，『救國』的重要性要比『建國』大得多。本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曾開宗明義的說：『抗戰之目的，在於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以救國家民族於垂危；同時於抗戰之中，加緊工作，以完成建國之任務』。可知抗戰的主要目的在『救國』，其最後目的才是『建國』，救國是抗戰的前提，建國是抗戰的終結；其中緩急輕重是極其顯明的。所以我們對於過去只喊『抗戰建國』的口號而不喊『抗戰救國』的口號，覺得是本末倒置的。

關於此種本末倒置的措施，我們想起一件事來了：在七七事變以前，那時的中日問題，因為蔣政府避不與日本直接談判，一直是在僵持之中；這種僵持的局面，持之不當，固然要惡化，持之得當，亦未始不能好轉。但是當時唯恐天下不亂的共產黨及人民陣線派，却不顧『好轉』的一面，只向『惡化』的一面鼓動所謂『救亡運動』，無形之中，掀起了鬥爭的狂潮，致使『救國建國同時致力』的政策無由實施，而政府當局也就不思自拔，甘願被逼於『建國不成』『救國無方』的地步。七七事變便是這樣惹成的。但是七七事變既經發作，則『救亡』『救國』應該是抗戰的惟一口號了，可是他們又避去『救國』與『抗戰』的聯繫，而另行拉出『建國』二字和『抗戰』連結起來，創出所謂『抗戰與建國不可分』的謬論。『他們為什麼要如此呢？現在想來，理由也很明白了：因為『救國』是臨時性的，『建國』是永久性的；如果以『抗戰救國』為口號，則在國可得救之日，抗戰便失其依據而不得不終止；現在以『抗戰建國』為口號，則因國家無年無月不要建設，而抗戰也就可以無年無月可以停止。共產黨及其嚮導是以煽動戰爭為目的的，由此可知從他們口中所喊出來的『救國』『建國』並不是

為的國家，而是為的他們的煽動政策。

我們之所以堅持『抗戰救國』而不贊同『抗戰建國』，並不是說在抗戰期間無庸建國，老實說，我們是要揭發共產黨及其走狗的毒辣的陰謀。國人如果了解我們的真意，了解國家民族之真正利害，便亦能了解我們現在所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口號的價值了。

如前所述，中國因為遭遇外來的侵略，所以不得不起抵抗，否則便要亡國。很顯然的，抵抗的目的在於救國，而亡國的因素在於外來的侵略；假定外力已不再侵略我國，則亡國的因素已經消滅，救國便無意義可言，自然也談不到抵抗了。這個假定若是真確的，那末結論亦必真確。所以，現在的中日問題，只有『日本是否再要侵略中國』一個問題，沒有其他。關於這個問題，在本文第一二兩節已詳為說述，證明日本確已覺悟，不再侵略中國。日本既不再侵略，是國家業已獲救，剩下來的，只有『使劫後餘生如何恢復其元氣』一個問題而已，易言之，即如何從實現中日和平進而建設新生命而已。我們的『和平建國』的口說便是這樣提出的。明瞭了這一點，便可知『和平』與『抗戰』不是相反的兩事，而是由救國到建國所經過的兩個階段；同時可以知道，抗戰是為國，和平也是為國，不過在表現的形態上，前者是採取敵對性的劇烈戰爭，後者是採取互助性的平等合作；其最後目的皆在於實現國家的獨立自由。

由『救國建國同時致力』到『抗戰救國』，由『抗戰救國』到『和平建國』，它的發展不是偶然的，它的意義不是可以隨便曲解的。我們要求國人，以擁護過去的抗戰的那種決心來擁護現在的和平，要以理解過去的救國來理解現在的建國。

（未完）

專載 和平運動期間之民衆運動方法論（下）

楊靜之

—128—

民衆運動是要民衆，不是推開民衆；

民衆運動是領導民衆，不是利用民衆；

民衆運動是爲民衆，不是數民衆爲我。

三

現在來說說對外的方法，就是怎樣開闢民衆來歸的路，以增強民衆的向心力？

民心的向背，就普通條件而言，是非常簡單的：就是需要問題。若適合民衆的需要，便「向」；不適合他的需要，便「背」。民衆的需要，可以分爲「公的」和「私的」兩方面來說：在公的方面，是民衆對於國家的需要；如果一種政策在民衆看來是合於國家需要的，他會擁護這政策，否則便反對。在私的方面，是民衆對於本身的需要；如果一種政策民衆認爲合於他本身的需要，他便擁護，否則便反對。民衆對於國家的需要，其性質以屬於精神方面者爲多；而對於個人方面的需要，其性質以屬於物質方面者爲多。如果某種政策僅合於國家的需要而對某些民衆的需要則覺不甚適合，

或是合於某些民衆的需要而對於國家的需要不合，則此種政策之不能爲全國民衆所擁護，自不待言。

我們現在已認定和平政策不僅合於國家的需要，亦合於一切民衆的需要，所以在政策本身上是無庸置議的了；現在所要說的，就是用什麼方法使民衆知道合於需要之理由，使他們信仰，使他們來歸。

孟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前面所述民衆對於國家的需要，其性質以屬於精神方面者爲多，可以稱之爲「義」；而民衆對於個人的需要，其性質以屬於物質方面者爲多，可以稱之爲「利」。民衆中，因其心理與知能之不同，故對其講道論理，不得有「喻義」「喻利」之別。「義」與「利」二者的性質雖各不同，但在其滿足民衆需要的作用一點上，却是一樣的。一般人的意識，多

以「義」爲美德，而「利」是惡念；其實這種見解只是舊倫理上的一種虛覺，並無社會學上的價值。「惟利是圖」的心理固然是不道德的，但是玄虛的舊禮教的摹倣亦不見得是真的道德。要之，義與利的評價，不在外表的形態，而在內在的實質。有價值的義是合理的義，即所謂「正義」；正義不是偏狹的，譬如到現在還忠於重慶的人，在舊倫理是很有「義氣」的，可是他的忠是誤忠，故其義亦不能稱爲正義。有價值的利是合理的利，可稱之爲「權利」；權利不是卑鄙的，譬如現在的民衆爲要求自身的安全生存而擁護和平，這在重慶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他的要求雖是以個人爲出發點，却未妨礙到國家的利益，故其要求乃是合理的權利。我們明白這一點，纔能把握民衆心理，纔能對準民衆的需要實施獲得民心的方法，纔能收得民衆運動

的實際效果。如果我們開始便把「義」與「利」的本質弄錯，又把「君子」與「小人」強爲區分；那末，充其量，不過是在抽象的觀念上強調一些所謂君子所謂大義的精神說素，決不能收穫政治上的實際成效。其次焉者，則不免索性惟以「利」爲前提，憑藉金錢與勢力，威嚇利誘，買空賣空，鑽營搶奪，無所不爲；這自然是把「權利」當做「贖物」看待了。過去蔣介石的衛隊式的民衆運動就是如此。

我們第一要認識義與利的正確意義，第二要辨別義與利的真實用途。在民衆運動的方法上，所謂「君子喻於義」，可以這樣說：「對於那些知識較高的民衆，要以義爲前提，以他們本身的需要爲第一義」。當然，所謂「前提」與「第一義」，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這就是說：言義時常顧到利，言利時亦常顧到義；言國家的需要時亦顧到民衆的需要，言民衆的需要時亦顧到國家的需要。輕重先後雖有不同，其完成「正義」與「權利」，以及完成「國家的需要」與「民衆的需要」則一。總理生平就是用這種方法來領

導民衆的；例如他的演講，對各種不同的聽衆有各種不同的內容與方式，而其最終目的却無二致。所以我們現在要推動民衆參加和平運動，無論是宣傳工作，訓練工作或實際行動，必須依照民衆在實際狀況之中的需要，採取最適合的技術。

果能如此，必能使民衆樂於來歸。現在再就上述原則談一談幾件經常工作。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調查與統計。如上所述，要使民衆來歸，必須在方法上適合民衆的需要；但是民衆的類型很多，他們的需要（精神的及物質的）亦極不一律。權統的說：民衆對於國家的需要是獨立自由與平等，對於本身的需要是生活安全與進步。但是我們若以爲所有民衆的需要皆是如此而已，那就與不知道民衆的需要相等了。因爲人類在通性之外還有個性，而每個民衆的個性的發展趨勢又往往較之通性的發展趨勢爲強。所以在各個民衆之間，他們的需要亦往往因個性的發展而有很大差異。即就一般通性而言，也往往因爲個性的差異而有多種不同的姿態；例如對於國家所需要的獨立自由與平等，及對於本身

所需要的生活的安全與進步，在程度既不會完全一致，在實質上尤有種種差異。在實施活動方案的時候，若不明悉他們的通性的及個性的實際狀況，即無從探知他們的實際需要，至於需要的正當與否更是無從精確判斷了。在這種模糊狀態之下實施民運，其不易獲得要領，可不待言。不僅如此，在民衆的通性個性及其需要之外，關於民衆生活的各種主觀事實及客觀環境，也是實施上必須知道的因子。凡此種種，皆有待於精密的調查與統計。我們可以說，只要能把民衆的諸般情形調查得瞭如指掌，則不特工作上得有極大的便利，同時工作的結果也很可以預先估計出來。

接着調查的工作是宣傳。對準民衆的需要，宣傳必要的主張，先使民衆覺知需要的歸趨，宣傳無需誇大，不可歪曲，不可漠視對象的現實。對一個商人，一個勞工，一個大學生，一個報館記者，對任何一類民衆，要有某一種的宣傳技術。對何等人要用出版物，對何等人要用播音機，對何等人要用集體指導或當面攀談，也不是劃一不二的。總要記牢他是何等人，有何種需要，該用何種方法。

宣傳工作應該有反應。假使毫無反應，那末一定是所做的工作缺乏力的作用，沒有能夠抓到民衆的心理；這在工作上是犯了幼稚病。假使反應是反面的惡劣的，那末一定是工作上把力用錯了，沒有辨清民衆的需要；這在工作上是犯了錯誤病。許多宣傳家往往只採行正面的灌輸，他的方法是演譯的，消極的，這種方法最不容易獲得民衆的同情。合於民衆需要的宣傳要用歸納法，辯證法，要按照民衆的現實狀況，實施合乎現實需要的各種宣傳與討論，而後把各個的宣傳效果合成整個的效果；縱然因爲民衆意識的錯誤而必須加以矯正，那也只好以採行誘導的方法，用彈力把它拉過來。由這些積極的方法實施宣傳，至少是不會引起民衆的反感的。

其次就是組織。組織必須在調查與宣傳之後，纔能組成活動有力的有機體；如一般幹民運的人，往往把組織列爲第一步，他們以爲只要民衆組織起來（實在就是把民衆團體成立起來），民衆運動便有了成績了；可是他們並未看清由這樣組成的民衆組織只是一些死的名目，毫無民衆運動的意味，而這些組織即或是在活動，它的活動方向也就難免

離奇可怕。所謂「民衆的向心力」的作用，自然是更談不到了。這是我對於民衆組織的步驟上認爲最關緊要的一點。

組織民衆也應該採用由下而上的歸納法。在實施這種工作的時候，可以不必拘泥那些固定的形式；例如——拿民衆團體的名稱來講：有兩個工會，雖然性質是相同的，甲工會因爲沒有問題而可以稱爲某某工會，乙工會却有着某種問題，那就不必堅稱爲某某工會，用任何名稱來代表它都可以。最要緊的是這個組織對於運動綱領有沒有認識？組織份子不是有着一個活的核心？假使這兩點辦不到，那末這個組織就是空的，死的，徒然在工會目錄上多佔一行地位而已。

要使民衆組織成爲活的有機體，除了預先由調查及宣傳兩件工作培養組織份子的活力（認識與信仰），還要在組成之後不斷加以訓練。一般民衆組織，對於組織份子只有人事的安排，而缺少活動的訓練；所以每一個民衆團體好像一個加官圖的衙門，有時是一事不做的連官僚式的衙門還不如。這種民衆組織還是空的死的。訓練民衆組織的份子的目

的，在積極方面是增強活動的能力與指示活動的方向，在消極方面是消滅夾帶未清的雜色成分。原來，一般民衆的社會活動能力是很薄弱的，自須予以培育；而大多數民衆的思想之幼稚、見解之不正、行動之紊亂，尤須加以矯正。如果民衆組織缺乏適宜的訓練工作，則因原始的雜成分的醞釀與滋長，難免有養癰成患之虞。同樣的理由，不僅訓練一事，調查與宣傳也應該繼續不斷的實施。這樣的繼續不斷的工作，纔能使民衆的向心力繼續不斷的增強。而且，關於調查、宣傳、訓練以及其他各種行動，不必限定爲每個民衆組織的首腦人物，更要把這些責任儘其可能的分擔給每個份子，由每個份子傳達到一般民衆。這一個作用，可以說就是民衆運動的「運動」，在這個運動上所發生的效果纔是民衆運動的真效果。

民衆運動是「爲」民衆的，是「屬於」民衆的；不是「爲」某一特殊階級，也不是「屬於」某一種的人。所以民衆運動必須「從」民衆做起，又須做到民衆裏面去；這樣，民衆才會真正的一起來，才有「力」。

（完）

蘇聯怎樣侵略芬蘭

鎮南

蘇聯前外長李維諾夫，於一九三三年軍縮會議席上，對「侵略者」作嚴格之定義，謂各國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當視為侵略者：（一）向他國宣戰者，（二）未經宣戰而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者，（三）未經宣戰而以武力攻擊他國輪船飛機者，（四）以軍艦封鎖他國海岸或港口者，（五）各國凡從其境內收容他國武裝份子並加以贊助以襲擊他國領土者。並謂，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或其他方面，有何理由，均不得作為侵略之口實。——話是蘇聯自己說的，行爲是蘇聯自己做的。

雖然日本是一個渺小的島國而中國是碩大無朋，但在中日戰事的初期形態上來講，究竟日本是以侵略的方式以對待中國，而中國是被侵略國，這是無可置疑的。現在的蘇聯便也仿用這種形態，說是因爲芬蘭要侵略蘇聯，所以不得不予以抵抗了。

克姆林宮的巧妙真夠得上稱爲巧妙，它會使一班人尤其是失去靈性的人們，對於它的一切措施無法辯論，例如上面所述的比擬。但是，即說我們一班上了年紀的人們誠已失去靈性，倘是拉一位還保持着人性的天真的小學生來問他：『蘇聯和芬蘭戰爭起來了，你看是誰個侵略誰個？』除非這位小學生還未讀到外國地理，只要他有一點常識，必能毫無猶豫的回答出來的。

蘇聯的疆土有八百餘萬方哩，而芬蘭只有她的六十分之一還不到的十三萬方哩；蘇聯的人口有一萬萬六千餘萬，而芬蘭只有她的四十分之一還不到的三百六十萬；就兵力來說，芬蘭全國兵力只有四十萬，精銳者不過七個師團，而蘇聯的兵力，單就此次進攻芬蘭的由梅萊斯可夫將軍所統率的第七軍團，即在五十萬以上，而且大部份是機械化部隊。一隻龐大的馴象被一隻細小的鼯鼠所窘，那是有的；一只兇狂的獅子被一只又弱又小的山羊所迫，這是小學生所能想像的嗎？

？然而，克姆林宮的赤色宣傳家偏要堅持此說。

過去的英法蘇三國談判，翻來覆去的延宕了老半年，終於不能成就；其間應負延宕推諉之責者，一直是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是非難辨之中。蘇芬談判也是照樣翻來覆去的延宕了兩個月，而結果是非但談判無所成就，却是兩下相打起來了。在談判的時候，蘇芬雙方所要求的條件和所爭執的要點究竟誰是誰非那是盡人皆知的事，不必細舉；只就「終於相打起來」的結局而言，對於前此使談判延宕而無所成就的責任，大概不致再像英法蘇三國談判之是非莫辨吧？

事實上，蘇芬談判在上月九日即因蘇聯所提條件太苛而告停頓；可是蘇聯在談判停頓後不久，又由發表聲明的方式，以命令的口吻要求芬蘭重開談判，並以「如談判不成則有嚴重後果」相威嚇。芬蘭難道不願談判嗎？不說不願，實在也不敢不願。可是當芬蘭政府正在準備提出對案的時候，蘇聯的第二攻勢又來了。在二十六日這天，莫洛托夫把芬蘭駐蘇公使葉柯基叫來說是因爲芬蘭軍隊在卡萊尼亞地狹地方向蘇俄國境開炮，致使局勢益趨嚴重，所以要求芬軍非立刻撤退二十至二十五公里不可。蘇聯所根據的哲理是「山羊胆敢侵略獅子」，這真是千古奇聞，事體便是這樣發作的。

可憐山羊真個胆敢撩撥獅子嗎？牠是連夢也不會做過。

據中立國家的證明：芬蘭邊防軍中的炮隊以野砲的射程為最遠，但距離邊境尚有二十公里之遙，重砲則更在五十公里之後，根本無射入蘇聯國境之可能；同時二十六日這天正是星期日，芬軍軍官皆參加宗教儀式，也沒有一定揀選這一天來開砲的必要。事實上，炮是開的，可是開砲的地方是在蘇聯境內的梅尼拉鎮附近，而駐在該鎮一帶的蘇聯防軍僅距邊界八百公尺。

蘇聯自己放一把野火而把責任謗諸他人，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還記得德波戰爭之初，德國不也是藉口波蘭邊防軍攻入德境而大張其撻伐的嗎？這種所謂「神經戰爭」的初步，在芬蘭本也看得很清楚；不過芬蘭更清楚自己到底是一只山羊，雖明知蘇聯的蓄意挑釁也不敢對面抗爭。在莫洛托夫的通告到達芬京之後，第二天即二十七日，芬政府便以最容忍的態度答覆蘇聯，對於撤兵一事，願予照辦，但要求蘇方同樣撤兵；即對開砲一點，雖一面否認，一面亦提議由雙方派員調查。假使「退步」也有止境的話，芬蘭實已退到最後境界了。但是蘇聯的態度是怎樣呢？

在第三天即二十八日，蘇聯覆文說：(一)芬蘭否認開砲實為毫無理由；(二)蘇芬兩軍地位太不平等，列寧格勒受芬軍之嚴重威脅；且蘇軍亦無同樣撤退之餘地；(三)認芬蘭違反蘇芬互不侵犯條約精神，故蘇聯不再受該約之約束。這個覆文，簡言之，就是片面廢約。蘇聯在廢約的同時，也不待芬蘭的回答，便遣派大軍，分三路向芬蘭進犯，和德軍之進犯波蘭一樣。

什麼理由都可以不談，說是列寧格勒受芬蘭的威脅，却是天大的笑話。芬蘭果會威脅列寧格勒與否，那是有史以來的事實可以查考的，其實也毋庸查考，誰都能說明這個問題

根本不能成立。倒是另外有一點可以查攷的，就是本年五六月間為埃倫特島設防問題，蘇聯向芬蘭爭執時，何以蘇方不提出列寧格勒受威脅，而到臨近列寧格勒的立愛拉三小國俱已收服、形勢更為鞏固之後，才提出這問題呢？

本來，這種笑話的實際理由也很簡單，就是芬蘭沒有像立愛拉三小國的無條件而被收服；假使芬蘭服服貼貼的承認其為蘇聯的保護國，什麼問題也沒有了。蘇聯現在是感覺到國土還不夠大，所以非大加開拓不可。她對進攻芬蘭，不是為列寧格勒的安全，乃是為莫斯科的食慾。爽截言之，她是要征服芬蘭。

在二十六日這天，莫斯科真理報公然撰文侮辱芬總理賈尚德，題為「小丑盤踞要津」，說賈尚德是與波蘭前總統莫錫基及柏克外長同屬一流人物。這種不顧國體的作爲，還把芬蘭當做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嗎？不僅如此，她還正式通告芬蘭必須改組政府。當然，強權之下，焉有公理？賈尚德內閣爲要保全芬蘭的國運，不惜忍辱含垢，遵命改組，成立一個中立派的里蒂內閣，以爲可以稍獲蘇聯之憐惜而進行保全國運之談判。但是蘇聯又是怎樣呢？在本月一日里蒂內閣成立之日，她已同時在佔領區特利基地方造成另一傀儡的所謂「人民政府」，而這個「政府」的首腦正是早被芬驅逐出境的共產黨領袖顧錫納，是從莫斯科奉命而來的。事情還不明白嗎？

里蒂內閣成立之日，即通告蘇聯願意談判和平，但蘇聯的回答是：「里蒂內閣中尚有不良份子存在，故不能認爲良好政府」。而一面却已承認「人民政府」，並相與訂立合作條約了。在此左右逢源期間，蘇聯又一面以哀的美敦書通告芬蘭道：「除非芬蘭今日接受蘇聯國的全國要求，則蘇聯將立即摧毀之」。事情不是更明白了嗎？

芬蘭之遭遇與中國

楊乃匡

芬蘭的賈尚德內閣在遭受蘇聯的強暴侵略後，鑒於事態嚴重，深恐直線地支持下去，芬蘭的國運終不可保，因此自動改組，由中立派人物里蒂重組新閣；希望在爲蘇聯留有餘步的忍讓態度之下，挽救九死一生的國家之危亡。此種公忠爲國的精神，不僅氣概軒昂，亦且目光遠大，決非不識利害不知進退一味蠻幹瞎幹的蔣介石政府可比。倘使蔣介石也有此等公忠爲國的精神，自動下野，讓其他公忠領袖來處理國事，則因日本已不像蘇聯之存心侵略，中日戰事早已解決了。我們對於芬蘭國之由賈尚德內閣改組里蒂內閣，深深感佩芬蘭國是進步的，決不是政治的退化或崩潰。這

個國家，今日雖因蘇聯的猛烈侵略而陷於極端危困，但是她的前途終有抬頭的一日。

芬蘭的進步精神還可以從現內閣的對外態度看得出來。無疑的，里蒂內閣之產生，其目的是在和緩蘇芬的尖銳敵勢；可是她的演出，決不是對蘇屈服，不過因爲自知形勢優劣懸殊而不得不對

蘇相當退讓而已。退讓與屈服是不可混爲一談的。里蒂在新閣成立之日，對外宣言：「吾人仍望以談判方式與蘇聯謀糾紛之解決，但不能以吾國之獨立與自決權利換取苟安局面。萬一外交絕望，我人將繼續作戰以貫徹我人之立場」（合衆社紐約三日電）。這種態度何等坦白，何等嚴正！她與蔣政府之既不能戰又不和的卑鄙心理，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其次，里蒂內閣雖明知自力太弱，不能與蘇聯長久爲敵，但她也決不因自力薄弱而乞憐於實際無補的他人。里蒂總理說：「我人將以單獨一國之力量與蘇聯作戰。……我人在精神上獲有英法之支持，惟軍事上因我人所處地位之隔絕，勢難獲得英法之援助。……吾人對於美國之精神援助，極表感荷，但吾人並不希望美國更作進一步之援助」（同上電。）再把這種自力更生的態度和蔣政府的依賴成性的態度來比照，吾人將又有什麼感想呢？

我們只記得，中日戰爭發生以來，

蔣政府沒有一天不在恬不知恥的向各國乞憐，可是所乞得的究有幾何？而且當它向人乞憐時，更是不擇手段。今日求英，明日求美，後日又求蘇。它看到人家並不怎樣爲其所動，竟會施用哄騙的技倆，說是日本侵略中國對於第三國是如何不利，因而說中國是爲英國而戰，爲美國而戰。尤其是最近日軍之進攻，蔣政府的機關報中央日報於本月三日撰文評述，謂日軍攻桂是兩進政策之初步，目的在獲得將來進攻安南的根據地。實言之，日軍攻桂是對法國，實際上並不是對中國。因此要求法國要特別注意，要與中國合作。試問，這種論調如果出之里蒂內閣之口，說蘇聯進攻芬蘭的目的在於對英對法而非芬蘭本身之事，世人的觀感又將何如呢！

我們眼見着：芬蘭有賢明的政治當局而無自力更生的機會，中國有着自力更生的機會而偏偏爲昏憤無能的蔣政府所阻害；真令吾人不禁仰對青天，嗟嘆上帝對於弱小國家的無情！然而，我們竟以嗟嘆而終嗎？不！先哲曾告訴我們：「人定可以勝天」；我們決不因爲蔣政府的阻害而捨棄中國的自力更生的機會！

一

南寧失陷中之啼笑皆非錄

仲平

在地理上所指出南寧對於重慶政的府要重要性，是不會在長沙或漢口之下的。但是從十一月十五日日軍北海登陸起，爲時不過十日，此西南重鎮之南寧，便於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失陷了。最可慘的，失陷的前二日即二十二日，桂林各界剛纔成立所謂「保衛大西南工作委員會」，上海各報正想跟着高喊「保衛大南寧」的口號，可是連氣還未喘出口來，大南寧已經完了。保衛大上海，大南京，大徐州，大武漢，每次的例行口號，都曾轟動一時，獨有保衛大南寧的口號，則寂然無聞，也可說是南寧之大不幸吧！

此次南寧的失陷經過，和過去各大城市的失陷還是一樣的；雖然重慶當局會一再宣傳西南防務之如何鞏固，戰略之如何改良，可是在南寧一戰上，仍舊沒有絲毫新的演出。潰敗的速度是和廣州相等，潰敗的方式更是和過去的每次潰退相同。

在二十三日那天，日軍已抵達南寧近郊的時候，白崇禧還在狂吹「華軍之力量，足以擊退日軍侵犯桂省之攻勢」(重慶路透電)。但是一面又說：「華南華軍現爲誘引日軍深入計，已將離南寧五五公哩之大塘墟軍隊作戰略上之撤退；此間對於南寧之陷落，不甚注意」(同日重慶合衆社電)。其實，當時南寧方面的華軍，大部分是民團等雜色軍隊(廿四日香港電)東拉西湊，根本夠不上作戰，尤其談不到戰略。故在翌的(廿四日)，即因援兵不到而陷落了。桂軍潰退的時候，照焦土政策之成例，把全部精華付之一炬，而且給一個新名詞曰「空室清野」。其理由，又照例說是一城內無險可守，

且已索得重大代價，故轉移後方有利地位，繼續抗戰」(廿七日重慶電)。

有一點新的演出沒有呢？南寧之失陷，它不過是蔣家戰略的舊詩新抄而已。

蔣家祖傳的舊詩是不勝枚舉的：例如在它的「戰略舊詩」之後，必然有一大篇爲說明「戰略舊詩」而擬定的「宣傳舊詩」。我們看出，接着南寧的如桂林，如昆明，如貴陽，以至重慶，皆在「蔣家戰略」之下重演「潰敗之抗戰」的可能；現在爲一勞永逸計，把南寧潰敗後的「宣傳舊詩」摘要抄錄，以備日後翻閱，蓋亦可更深一步以認識「蔣家戰略」之實際性質也。桂林二十七日電：「此間人士咸對戰局前途抱樂觀情緒，認爲日孤軍深入，無異予華軍以再建殊功之機會。某一點之得失，實未可決定全而之成敗也。……日軍第一線所處地位，實三面受攻一面背水之絕境，此則任何兵家所切慮者。已窮蹙之日軍，爲冒險倖進心理所迷，雖躍身陷阱而不自覺也。……日軍兵力至爲脆弱，決難當華軍雷霆萬鈞之反擊；華軍所取軍事措置，非一般人所得而知。所可報道者，即華軍之良好空間與時間業已接近，所謂「全軍覆沒」斷非日軍所能逃避的命運。此間人士咸具有不可撼動之信念，深信「勝利的明天」之來臨，祇在瞬息間耳」。

二十五日合衆社重慶電，陳誠將軍聲稱：「日軍之進攻廣西，爲華軍有利之處，蓋日方之陣線，從此更加延長也。……時間爲決定近代戰爭之重要因素，凡不能作消耗戰者，早晚將歸失敗也。因時間爲戰爭之重要因素，故吾人作戰愈

久即愈益強勁；同時，戰區愈延廣，則愈利我人。故日軍今次對於廣西之進犯，則愈可供我人多一消耗日軍機會矣。

二十八日同上電，據華方軍事發言人談稱：「日軍向內地進犯，華軍一面予以正面之堅強打擊，一面誘日軍深入再施圍攻。……今次日軍之深入，為華方預定之計劃，以期造成合圍聚殲之形勢。……日軍歸既不得，而進又不能，勢必遭受最慘之殲滅命運。」

本月四日快訊社重慶電，據某將軍談稱「進攻桂南之日軍，由於華方「空室清野」工作之澈底，所到之處，如入鷄犬不聞之空城，攻守皆無人，物資可供利用。華軍在西南方面之戰略，基於下列二原則：（一）避開點線上之爭，而利空間及時間，以打擊日軍之主力；（二）澈底實行「空室清野」工作，使日軍終無所獲。」

最莫明其妙的，桂主席黃旭初於三十日發表一篇「告廣西省民衆書」，裏面既然說到「現在日軍已侵入我人家鄉，若不予以重大打擊，任其蹂躪，豈徒令中外人士對我失望，實為我桂人民恥辱」，照理是應該抵抗的了，但他又接着說：「各市鎮鄉村，須於日軍未來之先，空室清野，預行疏散，務不留一物，以資敵用」。既然說日軍未來之先就該空室清野，但他又說「須知日人戰鬥至今已屬外強中乾，無足深畏」，還有一篇更妙的妙文，是「中國軍界前輩」丁慕韓的大作，題為「日人結局的預測」；他說：「他（指日人）將來的結果，只有軍人自己脫下軍衣，繳下槍砲，求我們收留他做老百姓。這時他們的統御者已消滅。這時候并不遠，早在明春，不適當過不了明年秋天。」

此外，還有一篇重慶政府的機關報中央日報的本月三日社評「論日軍進攻桂省之意義」，略謂：「當法駐華大使戈思默甫由滬返重慶任所之際，日軍即在北海方面登陸，並

侵入桂省；日軍此項行動，具有深長之意義。日軍此次進犯桂省，在名義上謂為若切斷滇方西南國際交通線，但在實際上，乃係為將來進攻安南佈置另一根據地。換言之，日軍之佔據南寧，乃日軍南進計劃中之預定步驟。日軍先後佔領斯萊島、海南島及閩洲島後，現又佔據南寧；是以，日軍已完其對安南之三面包圍形勢。日本駐法外交官，雖已向法方聲明；日軍今次進攻桂省之目的，係欲切斷渝方軍火運輸線，但事實則不然。……請法大使注意此事，並希望中法兩國間之合作，蓋趨密固。……這篇社評與上述各段的宣傳資料不同，是對外的。上月二十五日，重慶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也有一篇論日軍攻桂的社論，說是日軍攻桂在於威脅英法兩國。

以上所舉的一些「宣傳」資料，在文字的表面雖然都是新的，而其內容則與前此每次戰敗後的宣傳毫無兩樣。總括其內容，不外下列幾句：即「華方的戰略是消耗戰，只要取得代價便當轉移陣地」，「日軍愈深入，則其潰滅之期愈近」，「日軍進攻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在威脅第三國家，尤其是英法，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小的」，「華軍的力量是一天一天的增強，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這些「萬年青」的爛調皆是蔣介石及其背後的共產黨久已批定的條文，現在不過是適應時節而由諸色人等加以覆播而已。我們對於這些爛調的本來面目及其荒唐無稽之處，除了惹起一陣啼笑皆非的慘痛情緒之外，根本不屑再加攻擊。同時我們也可推知凡是稍具理智稍存天良的人，讀了這些爛調後，他們的反感是不會和我們有什麼兩樣。

南寧失陷了，第二第三個南寧將繼續挨到吧。蔣家戰略還是要舊詩新抄的，繼着戰略的舊詩之後，同上而一樣的那些宣傳的舊詩也還是新抄的；現在我們是預先把它抄好，等着日後來對證古本好了。

英國欺弄波蘭的聲影

Samuel Grafton 著
劉 粵 譯

——自 New York Post ——

英國申言保障波蘭之獨立生存，是在本年三月三十一日；而德國侵略波蘭，是在本年九月一號。這中間距有五個月之久的時間。在這五個月之中，英國究竟幹了些什麼以助波蘭抵抗侵略呢？

英國給予波蘭的保證，好似一朵鮮花；波蘭人把這朵鮮花，佩帶在胸前，便覺得可以抑阻納粹的進軍了。就我所知，在波蘭的邊境，連戰壕都沒有挖掘。七月間，有英國軍官數人，訪問波蘭，在波蘭境內，他們向四週一看，他們祇覺得驚駭，以為波蘭人都是外國人，都是些不操英語的外國人，于是這一行軍官，便忽忽地回到英國去了。

在仲夏的時候，英國打算以金鎊五百萬貸予波蘭，這就是英國用以保障文明的款子，合美金祇有二千五百萬元。但就連這一筆區區的借款，一直到很遲的時候纔交給波蘭。因為英國的內閣，以其一向遲緩的態度，翻來覆去地熱烈的辯論着：究竟是否要強迫波蘭，把這宗款子用在英國身上。這樣一再的磋商，耽擱了幾個星期，而那時世界的烽火，已經在那裏熱烘烘地燃燒起來了。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選載) 毛一波 譯

十四 俄羅斯的反共產黨運動

一九二一年以前，長時期的戰爭，革命和內亂，把俄羅斯疲勞困乏已極，陷人民於失望之境，但最後內亂是終止了。許多戰綫的應付與爭論，協約的干涉俄羅斯反動革命的最後希望已是失敗了，而在俄羅斯內的軍事行動告終了。於是民衆信以為能夠看見布爾什維克的苛刻制度之緩和。熱烈地期望隨着內亂的終止，共產黨將減輕這負擔，廢止戰時限制，建樹若干之根本的自由，而且開始常態的社會生活。因為最初想獲得民心，布爾什維克政府曾屢次聲明軍事終了即專心經濟改造。於是民衆便真的與布黨合作，用他的豐富和創造的才能，對着這荒廢土地施以改造。

最不幸的，是這等的期待歸於泡影。共產黨國家表明掠奪的束縛之無視，壓迫政策依然持續存在。加之勞動者軍隊化，民衆更奴隸化；這新的壓迫與暴虐之苦痛的增加，遂使生產復興的可能性得一麻醉之結果。民衆最後的希望也是斷絕了，而確信共產黨保存政權，比保存革命更甚（譯者按：這即是說共產黨之目的，只在於保存政權，把社會革命看得很輕）。

俄羅斯最革命的份子，彼得格勒的勞動者，首先開口啓

計劃防禦德國進攻的時間，有五個月之多。但在戰事爆發的時候，英波所採取唯一的戰略，就是祈禱老天降雨。因為大家都認為這可以阻礙德國機械化部隊的活動，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在泥濘中是不能進行的。所以英國暗地竊笑德國說：看你究竟怎樣通過這個泥沼。

可是這班納粹們真的惡作劇，他們偏不候天公下雨便動起手來了：在英國政客可以出外釣魚的那種晴朗的天氣，他們迅速地殘酷地進攻了。結果，英國對波蘭的担保，成了波蘭壽終正寢以前最後的一吻。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即在波蘭向英國要求，請英國把那二千五百萬金元交給波蘭，作為對波蘭担保的時候，張伯倫手下的海外貿易次官赫森(Hudson)一日與一位納粹黨員華爾泰(Wohlthat)相值，彼時華氏正在倫敦街上等候電車，赫氏便向華氏提起，說英國願給德國五十萬萬元，作為免取新方案解決波蘭事件的代價。

換言之，張伯倫非常重視希特勒的諾言，他準備借給波蘭購買武器的借款，祇有二千五百萬金元，而對於希特勒一句諾言，竟出價五十萬萬，其間相差，達二百倍之多。但波蘭武器並未到手。五個月的時間，不為不多，很夠建築三道防線，很夠設置高射砲位，並建築道路，作為有計劃的退却之用。可是英國人並不如此作為，他們還是信賴他們自己的担保；並且他們還寫信給泰晤士報，希圖藉以阻止希特勒的行動。

七月二十號，當愛恩賽將軍(Gen. Ironside)仍在華沙，

言。他們知道民衆的不幸，其直接的原因，是為布爾什維克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與專制政府對待工人和農民。

所以等到彼得格勒的許多工廠和製造場已經閉鎖了，勞動者已是餓死了。他們便自動的集會去研究這局面，但政府對這集會却加以禁止。於是彼得格勒的勞動者（他們曾盡過很大的力，參加革命鬥爭，維持着共產黨的政權），非常憤慨政府的行動，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及後，他們又集會數次，也被禁止。共產黨對於勞動者既毫不讓步，且必要時又決定與歐美資本階級妥協，遂使勞動者激昂起來。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罷工的有巴德倫里兵工廠，和托波秋里、巴耳特司基、拉弗母各地方的工場。因談判決裂，於是這「工人與農民的政府」，乃有戰時防禦委員會之組織，以在彼得格勒最討厭之人李諾維埃夫為委員長，而該委員會居然宣布其目的在鎮壓罷工運動。

二月二十四日同盟罷工的宣言發出了。其時布爾什維克便派共產主義者軍官學校的學生（陸海軍的見習士），去禁止勞動者集會。第二日，風潮擴大，又加入一些罷工工廠，並遊行示威，作反抗政府的運動。但罷工者在街上游行時，却遭武裝軍隊的解散了。

二十六日，彼得格勒蘇維埃開了一個會議，在席上，有名的共產黨拉歌維其（防禦委員會革命委員），以激烈的言辭，非難同盟罷工運動。他以為托波秋里工廠的勞動者是煽動罷工的禍首，主張封閉這工廠。他攻擊他們為「自私的害羣

帶着痛苦的表情看着那些波蘭人民的時候，波蘭的陸軍，要求英國的轟炸機到波蘭來作示威飛行，但這件事並未實行，因為恐怕引起希特勒的憤怒。英國人之所以不這樣做，是恐怕把希特勒氣得發瘋，乃致不願接受他們的金錢。

在那時，英國的報紙，都大吹大擂，替波蘭虛張聲勢，說波蘭備有受過訓練的陸軍四百萬人；並謂這一支大軍是「專門用來應付防衛波蘭的特殊問題」的。可是這一套吹說，除傻瓜而外，歐洲任何軍人都不會相信。

大家都知道，波蘭的軍隊窮得連衣裳都沒得穿，還談什麼鎗砲？葛代(G. E. R. Gedye)在他的『中歐的暴亂』(Betrayal in Central Europe)一書中，關於在希特勒分割捷克時，波蘭軍隊乘機擄取德申區(Teachen)的事件，有一段記載。他說駐紮德申區的那些穿着漂亮制服全副武裝的捷克的軍隊，奉命撤退，讓波蘭軍隊進駐。捷軍一邊撤退，却一邊想一聽波軍的容，但是結果使他們驚異萬分。因為他們只見一羣烏合之衆，穿着補釘纒纒的軍服，不合身裁的大衣，肩着槍，開進了他們的防地。

波蘭的軍隊是如此如此，和波蘭國一樣的貧窮。當捷克兵士看見這一羣衣衫襤褸的而以一排機關鎗便可殺得淨光的武士們侵佔了他們的領土，他們不禁悽然淚下了。英國把那拯救文明的重任，原來是放在這一支極貧困(也許極勇敢)的軍隊的肩上。

那些納粹們，看到這一切情形，斷定英國不肯作戰了；這還值得奇怪嗎？

的勞動者和反革命黨！

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李諾維埃夫)對這提議採用了。凡罷工工人即加以閉鎖，而且剝奪了他們的食物。

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這種手段，使勞動者更感到不滿，且增加了敵對心。

同盟罷工宣言，是開始佈滿彼得格勒的街上了。而其中明白帶有政治的性質的且最重要的，是二月二十七日貼在城牆上的。

「政府的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第一：應予工人和農民以自由。不願他們生活布爾什維克的法令之下，他們願意能自由，自主：

同志們，保持革命的規律罷！組織起來向政府黨要求：一切被拘禁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黨全部釋放。廢除軍律，允許勞動者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允許工人作選舉工場委員的自由，並有選舉勞動組合和蘇維埃代表的自由！集會！決議！努力去實現你們的要求罷！」。

但政府對於罷工者的要求，不第不加允許，且逮捕他們，並破壞了勞動團體。於是民氣非常激昂，發生了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在二月二十八日發現了的社會黨工人的宣言，他是用一個立憲會議來號召的。於是末尾的口號是：

打倒共產主義！打倒蘇維埃政府！——一九二六——

日本與中國

Hallett Abend著
木 軍 譯

——自 Current History——

假如美國的外交注意力，並非集中於歐洲民主國與集權國之間的衝突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在東方之對英挑釁，真可說是胆大包天了；同時，日本的這種大膽的行爲，也可以說是目今世界上盛行的武力政治的一種新作風的例子。

五年前，或兩年前，假如有那一國的士兵，竟敢剝去英國人的衣服，而施以檢查，或鑿以耳光，我們想一想，事情會發展到如何嚴重的程度；或者在去年九月慕尼黑會議以前，假如有那一國的士兵，竟敢向英國的軍艦，開鎗射擊，或有那一國的軍官，竟敢以侮辱的態度，拒絕英國軍官之友誼的訪問，我們再設想一下，事情又會有怎樣結果。

可是，自從本年六月十四號以來，類此的事件，在天津不知發生了若干次了，而英國呢，除去提出抗議，和一再表示願以談判方式作爲地方事件加以解決而外，其他便一無反響。

日本敢封鎖天津英租界，敢在英租界的周圍，佈派崗哨，設置電網。日本之所以胆敢者，無他，祇因她那兩位反共軸心中的伙伴德意，又在那裏威脅歐洲的和平了。當北海與地中海的安全有了疑問的時候，要叫英國派軍艦飛機來華，事實是不可能的。

日本人很聰明，她在許多中立國之中，祇去挑選某一國，挑選了這一國之後，她便專和這一國作對。在天津事件之中，日本就是採用這個政策。當英日在東京開始談判天津事件，及有關天津事件諸問題的時候，日本聲言，謂祇有英國對華之援助，纔使得蔣介石將軍，能夠對日繼續抗戰。

其實美國給予中國的援助，和英國一樣，可是日本，在和英國作對的時候，她不照開罪美國。然而日本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理由。他們說：英國援助中國，使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犧牲生命，消耗

金錢，實在是替蘇聯削弱日本的力量，英國的這種行爲，不是因爲愚蠢，就是有意如此。

美國援助中國使日本的領袖們大惑不解，而英國援助中國竟使他們震怒非常。他們覺得美國政府，大半是受了她的人民對華同情之影響，但他們認爲英國的政策是一種冷酷的陰謀詭計。

有一位日本著名的外交家曾對我說：「美國外交政策是一向贊成遠東有一種強大而穩定的勢力之存在的，然美國難道就不知道：萬一日本崩潰了，在亞洲除去蘇聯而外，還有第二個一等強國麼？假如那樣一來，不管你對於共產主義或蘇聯的政治組織抱有怎樣的見解，世界的政治可太危險了。縱然日本就在目下完結了，要叫中國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這位外交家還告訴我說：「英國對於這種事實仍無認識，一直到現在，在中國衝突之中，她還在替蘇聯作傀儡。」

「蘇聯的政策，是利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使這次中日間不宣之戰，盡量拖延下去，她最後的目的，是要毀滅日本，赤化中國。可是在長期的戰爭中，中國也是要毀滅，但蘇聯並不覺得傷悼。」

爲什麼呢？因爲那樣一來，蘇聯可以毫無問題成爲亞洲唯一的巨人。你仔細想想看，在日下，世界上唯有蘇聯這個國家，在那裏帶着笑容，看着中日兩國相斃。其他各國，沒有不愁容滿面的，不是擔心他們在華的利益，便是同情中日衝突中廣大人羣所遭受的悲慘命運。

這位外交家還說，他和東京政府都抱有一個共同的見解。他們相信：假如日本退出中國，則中國政府，將立即實行排外政策，首先排斥英國，其次美國，再次法國，最後纔來排斥蘇聯。

日本領袖都相信，萬一中國獲得勝利的話，列強在亞洲，一切都完了。但是日本領袖沒有不相信日本會獲得勝利的。所以他們認爲英國的政策是矛盾的。不過這些日本領袖却不曾曉得，在英國的直覺看來，日本是終將戰敗的。

某日本要人曾對我說：「英國太蠢，且眼光也太短小。她使中日戰爭拖延日久，希望藉以保獲其在華利益，還希望將來能擴張其在華利益。殊不知她若永遠實行日下的這種政策，她在亞洲恐將失去一切，因爲日本是必然能夠戰勝的。年青力強的國家是不會失敗的，祇有那些老大的國家纔會失敗。論理，

英國應該設法結束中日戰爭，藉以保存其在華所剩的利益。英國在華擁有的利益最大，我們日本有一句格言說：「狂風之下：大樹不曲即折」。英國直到現在，尚無妥協的模樣」。

無疑的，日本人的思想與感情方面，是極端反英的。日本人的這種反英態度，是有其歷史的根源的。日下日本人對英的仇恨心理，以下面這件事實，便可看得非常明白。美國貸款給中國政府，日本人並不表示不以爲然，而英國貸款給中國政府，却引起日本人極大的仇恨。

我問這位日本要人說：「爲什麼美國借給中國美金二千五百萬元，日本一點也不表示憤怒，而英國貸給中國五百萬磅，其數目幾恰與美國的貸款相等，何以會引起日本舉國一致的譴責？」

那位日本要人回答說：「美國的態度根本和英國不同，不但自一九三七年中日衝突開始時是如此，即衝突以前的若干年中美國的態度根本和英國兩樣」。自從中日間不宜之戰爆發以來，美國駐遠東的海軍態度，簡直沒有可以非難的地方。這句話不是說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萊上將（Harry E. Yarnell）一向

以軟弱態度對付日本；事實上正相反，亞萊上將應付有關美國利益諸問題的時，其態度始終是嚴厲的，不屈不撓的。日本人都認爲亞萊上將是公正的，而認爲英國海軍的態度是偏倚的，乖戾的，而慣常採取以上對下的態度的。

日本解決潘南號事件非常迅速，但是一九三七年與潘南號軍艦同時遭日機轟炸的英國軍艦瓢虫號所受的一切損失，到現在日方尚未賠償分文。這兩件事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結果，實非偶然。

日本某重要發言人對我說：「英美海軍的政策，始終是絕對不同的。美國認爲，在大規模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炮於戰事本身智與不智，姑且不論），敵彈與彈片誤傷旁觀者這類事情，是在所不免的。但英國的態度却不同，他們說：既然沒有正式宣戰，他們便可在任何時間，來往於任何地區之內，但是在他們軍艦受了損毀，或有了傷亡的時候，這隻英國獅子便怒吼起來了。

「英美兩國政府與人民氣質，也有根本的不同。在潘南號被日機炸沉的時候，美國並未討論將如何採取報復的行動，反而有許多報紙和議員以及有地位的領袖，主張撤退戰區附近的美國僑民」。

——待續——

江南淪陷區域內日商工廠的活動

汪壽昌

八一三前，日商在滬所設之工廠，除紗廠九家外，尚有他種工廠四十八家。戰事發生以來，各廠全部停工或關閉。戰事西移後，日商各紗廠即相繼復工；其他各種工廠，亦隨着蟻蟻地發動起來。至一九三八年九月末：四十八家原有工廠中，已有六家復活；操業率小的，等於平時的百分之三十；操業率多的，且已完全恢復戰前的狀態。此外新設的工廠，還有六家。據日本「上海工業同志會」的調查：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止，日商在滬工廠及其活動的情形，有如下表：

名	稱	代表人	營業項目	資本金(單位日元)
寶成玻璃廠	神伊三郎	機器製瓶	七〇〇、〇〇〇	
東方製冰公司	小九保三九郎	冰汽水	五〇〇、〇〇〇	
東華紙器廠	岡島末太郎	紙器	二〇〇、〇〇〇	
康德燃料廠	尾崎武男	染料	〇〇〇、〇〇〇	
中華染色整煉公司	竹松真一	加工棉布絲綢	一〇〇〇、〇〇〇	
林茂爾電燈泡廠	島谷文雄	電燈泡	二〇〇、〇〇〇	
黃浦鐵廠	豐崎和平	鐵工	三五〇、〇〇〇	
第一工業公司	古瀨孫市	工業藥品石碱	一〇〇〇、〇〇〇	
大丸洋行	山根健一	敷物類	一〇〇〇、〇〇〇	
寶生玻璃廠	澤田可一	玻璃	二五〇、〇〇〇	
淡海洋行	太田常治	石料建築材料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中山鑄業廠	中山悅治	鐵板鐵條	一〇〇〇、〇〇〇	
野村木材公司	野村久一	木材製木機器	五二〇、〇〇〇	
大和造酒所	島傳	酒類	三〇〇、〇〇〇	
安位化學工業廠	小瀨木健平	蚊蟲香	一〇〇〇、〇〇〇	
山口洋行	山口清	建築家具	一〇〇〇、〇〇〇	
前田一二洋行	前田積吉	石鹼	三〇〇、〇〇〇	
光愛社農場	石崎良二	牛乳	一〇〇〇、〇〇〇	
康德橡皮公司	右川鼎造	橡膠	一〇〇〇、〇〇〇	
小林紗帶廠	小山辰一	紗布綁帶	三五〇、〇〇〇	
公和電工廠	藤井重治	銅工	五〇〇、〇〇〇	
康泰絨布廠	榎戶泰介	絨布	八〇〇、〇〇〇	
延年藥廠	橫谷重雄	製藥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亞細亞鋼業廠	村川善美	鐵板鐵條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公興鐵廠	瀨浪厚平	鐵工	二〇〇、〇〇〇	
明華糖廠	市橋彦三	製糖	四八〇、〇〇〇	
上海印刷公司	小平元	印刷	五〇〇、〇〇〇	
上海鉛錫合金會社	小畑寅吉	耐火煉瓦	五〇〇、〇〇〇	
上海毛織公司	山田一彦	毛織物	一五〇、〇〇〇	
島喜上海分店	細川勝治	醬油味料	二〇〇、〇〇〇	
美華印刷廠	川島卯三郎	染織	二〇〇、〇〇〇	
精版印刷公司	榎本保太郎	印刷	七五〇、〇〇〇	
須藤洋行	須藤佑七	電器機器	五〇〇、〇〇〇	
瑞豐洋行	勝川平	石鹼油脂	五〇〇、〇〇〇	
瑞新澱粉公司	小玉金次郎	澱粉	三〇〇、〇〇〇	
廣澤印刷所	廣澤民治	印刷	一〇〇、〇〇〇	
天通化學工廠	松山智雄	工業藥品	一〇〇、〇〇〇	
寶島化學工廠	松澤澤太郎	工業藥品	一〇〇、〇〇〇	
安樂毛織公司	伊藤武三	手織物	二〇〇、〇〇〇	
大安染色廠	和田真一	染織	二〇〇、〇〇〇	
上海電工廠	岡田初太郎	銅工	一五〇、〇〇〇	
三和精料工廠	青田萬藏夫	染料工業藥品	一五〇、〇〇〇	

祥昌洋行	鶴岡健三
上海化學工業	牛込佐源太
東洋製煙草公司	前田昌平
上海紙業公司	田上二雄
中和染色廠	田中初由
雙幅廠	上田安次郎
	皮革
	工業藥品
	煙草
	包皮紙紙漿
	染色

上海淪陷後，日本商人不僅繼軍事行動之後，來滬大肆活動，竭力恢復其原有的工廠；而且盡量勾引華商，與之「合作」。使拒絕不肯允從，那末，其最後的命運，不免所謂「軍管理」下為日人所接管，或由宣撫班接收而委託當地的「維持會」接辦，或由日商霸佔復業。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駐滬記者最近的調查：在江浙一帶淪陷區內，原由華商經營之紗廠、絲廠、麵粉廠、水泥廠、化學工業等等，業已委曲求全而在日人手中復工，或已進行「共同經營」者，或為所霸佔而開工者，有如下述：

- 一、工業 江浙一帶淪陷區內，現由日人經營之華商紗廠，計有三十七家，約有紗錠六十萬枚，布機五千三百餘台
- 二、蠶絲工業 無錫、蘇州、上海四郊、杭州、湖州、嘉興、海寧、德清等地之絲廠，則在日方為大股本的「華中蠶絲株式會社」所經營，（資本金共八百萬日圓，現金股六百萬，全為日方占有。現在實繳者僅三百萬；餘二百萬為實物股，則由華方依現有生產設備等折算繳齊）。
- 三、麵粉業 上海郊外之四家華商粉廠，已決定與日商三井及三菱合營之「製粉會社」實行「共同經營」；其中一廠且已開工。此外已決定與日「合作」的，尚有南京揚子麵粉廠之與佐藤貫一，無錫九豐麵粉廠之與上海吉田號之「合作」是。
- 四、水泥工業 與日商小野日水門士株式會社「合辦」的

，有上海水泥公司，南京之江南水泥公司。至南京之中國水泥公司，則與日商之磐城水門士株式會社「合作經營」。

五、浦口之永利化學工業社硫酸廠，已委託日商本洋高壓工業會社經營；現正復舊修理中。

六、上海之江南造船廠，則早在日海軍之「軍管理」下，而委託三菱重工業會社操作。

此外，上海四郊之華商工廠，現與日商「共同經營」而經該報查明者，據說有如下幾家：

- 現已加入之日商
- 五洲石鹼工廠
 - 中原烟草工廠
 - 新華烟草工廠
 - 華東烟草工廠
 - 華品烟草工廠
 - 美和糖精工廠
 - 樹膠廠一家
 - 中國冷藏廠
 - 印刷工廠一家
 - 錦新人造絲織廠
 - 華華毛織廠（浦東）
 - 中國毛絨紡織廠（楊樹浦）
 - 大中華造紙廠（吳淞）
 - 江南造紙廠（曹家渡）
 - 大章紙廠（楊樹浦）
 - 華盛益造紙廠（蘇州）
 - 某木材工廠（蘇州）
 - 某木材工廠（蘇州）
 - 浦東耶那廠（蘇州）
 - 公勤鐵廠（楊樹浦）
 - 立德油廠（閩北）
 - 中國家庭工業社石鹼工廠（閩北）
 - 振華油漆公司（閩北）
 - 開林油漆公司（江灣）
 - 日本油脂會社
 - 東洋烟草會社
 - 東亞烟草會社
 - 東亞烟草會社
 - 上谷喜三郎
 - 藤村一即
 - 前川製作所
 - 上海印刷會社
 - 武藤洋行
 - 上海紡織會社
 - 朱志方及永田藤
 - 日華製紙會社
 - 鐘淵紡織會社
 - 清水和吉氏
 - 上海紙業公司
 - 野村木材會社
 - 三井物產會社
 - 中山製鋼所
 - 亞細亞鋼鐵所
 - 日本油脂會社
 - 日本油脂會社
 - 大日本塗料會社
- 還有紡織工廠的活動，更見積極，因該項活動與全國各地有聯帶關係，當另行撰文敘述，此處不贅。

重振道德運動肅清共產黨

沈勇

在最近的一個時期當中，「重振道德運動」，可算得是很熱鬧很時髦的一樁事情了。據說重振道德運動還是一個普及世界的國際大運動，領導的人物都是名震一時的大老，如比利時皇帝利奧波得、法國總理達拉第、英國首相張伯倫、美國總統羅斯福及議院領袖華德曼等，均曾為這個重振道德運動的重大意義發表過沉痛懇切的談話；而我們中國，正事落後、閉事爭先的重慶政府，當然也不肯讓世界各國出盡風頭，而自甘歛抑其鋒芒；於是有了「蔣委員長暨僑胞」的對於重振道德運動的演說。

蔣及其夫人宋美齡女士的演說，大意謂中國是數千年的禮義之邦，對於道德是一向非常注重的，但是因為受了日本的侵略，以致中國道德問題跟着國運的艱危而日益淪胥，所以他堅堅持抗戰到底來打倒日本的侵略主義從而振救中國的古德；同時說世界的道德，也因受了東西兩方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弄得弱肉強食的境地，希望愛好和平愛護道德的國家，一致奮起，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而援助中國的抗戰，使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則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道德，就可同時重振起來了。言外之意，就是希望英法尤其是美國要無限制的予重慶政府以物質的、精神的援助，來支持其日趨沒落的抗戰壽命，以維繫其夢寐以求的「最高領袖」的地位。

所謂道德，我想世界各國，莫不有其崇尚的習慣與遵守的規律的，在我們中國，自古以來，談到道德，總直覺地想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或是「忠孝節義」來；假使看到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或是搗亂成性破壞和平的人，我們就毫不

遲疑地認為他是不道德者。所以重振道德這個運動，像在中國只要辦到使個個人都能夠切實遵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精神，實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信條，這就最有道德的國家了。

那末中國的道德問題，為什麼會弄到這樣破產的地步呢？雖然說這裏原因很多，但是最顯著最重要的還在於共產黨的搗亂。共產黨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愛、不講信義，不講和平的集團，牠只認得一個蘇聯，倡言工人無祖國，這是不忠；牠反對家庭制度，把人人都視為社會的動物，所以也沒有父子兄弟等倫理上的關係，這是不孝；牠好殺成性，所到之處，唯以殺人放火為能事，這是不仁不愛。至於信義，牠更視為無足重輕的東西；我們看蘇聯之條而親英法，條而聯德以侵略波蘭，最近更自食其扶助弱小民族前言來攻擊芬蘭；中國共產黨亦步亦趨的，一會兒表示效忠國民黨，一會兒又叛離國民黨。這等行為，就是不講信義。講到和平，共產黨且為陰謀的集團，牠唯恐天下不亂。蘇聯玩弄英法德諸國，教它們自相殘殺，牠便坐收漁人之利，獲得半個波蘭的領土；牠陰謀亦化遠東，便劫持蔣介石，指揮他使與日本開火，便可擄奪國民黨的政權，來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勢力。現在西歐的連天炮火，與遠東中日兩國兩年半以來的空前浩劫，都是共產主義者玩的拿手傑作。所以和平與共產黨，是根本不能同時並存的。

中國固然像蔣介石所說的是數千年來的禮義之邦，但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緣故，以至道德淪亡。就是以全世界言，假使沒有共產黨存在，我想國際間決不會有現在這樣風雨滿城的一日吧？而散處各國的共產黨人，更是破壞各國固有道德的種子。所以我們要重振道德，不論在中國，或世界其他各國，都非先來一個肅清共產黨運動不可。

予 欲 無 言 集

葉 紀 懷

五三 害人不淺的「援助」

英國大文豪蕭伯納評論蘇芬問題說：「芬蘭現時之厄運，應由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間接負責。因芬蘭政府推行近視政策，相信美國及英法必出而援助也」（本月四日亞姆特丹海通電）；可謂一針見血之言。此次芬蘭之被民主國家弄弄，是和波蘭一樣（見本期「英國欺弄波蘭的聲影」），也和中國一樣。不過，芬蘭却是覺悟了，新總理里蒂對外宣言：芬蘭只想自行作戰，不希望英法或美國作何等援助（參閱本期「芬蘭之遭遇與中國」）。也許有人要替芬蘭提心弔膽：一個蕙爾小國怎能夠抵抗偌大的一等強隣呢？但是我們認為倒不是芬蘭以自己的力量應付蘇聯，無論是作戰或是談判，結果總要比牽涉在「依賴的旋渦」中要好得多。我們相信芬蘭結局總不會像波蘭那樣慘痛。

再看我們中國是怎樣呢？那專門依賴他人的蔣政府，到現在還是不覺悟，天天巴望他國的援助。今天對美國呼籲，明天向英獻媚，後天向蘇聯叩首，再

後天又向法國打起秋風來了——日軍攻桂後居然指稱是對法國，說日本要攻安南。事實上，日美臨時商約快要締結了，日蘇談判快要完成了，而英法對日之遷就更無微不至。她們都是援助中國的喇！但是蔣介石能救她們不「援助」日本嗎？

宇宙間惟有真理是不會泯滅的。蕭伯納先生當仁不讓，根據真理，指責自己的國家當局誤害他人；而被誤害的人如蔣介石之流反而不知不覺，真可謂冥頑不靈了。

五四 毫無廉恥的蔣政府

最可笑者，重慶方面對於芬蘭的遭遇雖明知其與中國相同，却不敢發表一言。據本月一日重慶路透社電稱：「官場方面對蘇芬關係最近之發展，不加批評。……中國本身遭受侵略，對於為自由獨立與正義而奮鬥之芬蘭，自表深切之同情；但以目下蘇聯援助中國抗戰之關係，致對於此種同情不能作公開之表示。……中國目下對英蘇兩國，皆亟欲維持親善，以便獲得其援助，故所處

地位誠極為微妙也」。

是的，蔣政府的地位確是微妙之至，妙到連「同情正義」的話也不敢「公開表示」了。但是人世間的正義只有一種阿，蔣政府既然不能站到「正義的芬蘭」這方面來，同時還要仰承「反正義的蘇聯」的鼻息，別的都不用說，究竟蔣政府本身還是不是正義的呢？

其實我們的話也是多說的。蔣政府根本不知「正義」為何物，雖然它也掛着為正義而奮鬥的招牌，而實際所行所施，卻沒有一樣不是「不義」的事。豈止「不義」？它是連廉恥也毫無。

我們所看出的，重慶官方之所以對蘇芬事件不加批評者，只有一個字，就是「怕」，怕其隔壁老祖宗的蘇俄不承認自己做子孫也。據上月三十日東京路透社電，謂「莫斯科已訓令其駐重慶大使通知蔣介石，重慶政府對於國共間之齟齬，苟不速謀圓滿之解決，則渝蘇關係上或將發生嚴重之變動」云云。注意此消息雖來自東京，但係由路透社發出，決不致毫不可靠。事實上，不要說莫斯科，就是朱德毛澤東之一顰一蹙，蔣介石也莫不承迎惟恐不周。然則說蔣政府毫無廉恥是冤枉麼？